《明夷待访录》的“待访”意蕴

胡 发 贵

《明夷待访录》的开场序语中，黄宗羲由衷地感叹：“吾虽老矣，如箕子之见访，或庶几焉”，不想这几句抒怀的话倒引起了后世一起聚讼纷纭且又迟迟不能了结的争论。章太炎首先发难，他说：“黄太冲以明夷待访为名，陈义虽高，将俟虏下问”①；闻此，梁启超则立起反驳，“章太炎不喜欢梨洲，说这部书（《明夷待访录》，摘者）是向满洲上条陈，这是看错了。……（黄）岂有自己想向清廷讨生活之理”②；后人似偏向梁论，并以“此书之方法与其序文似是而非的矛盾”③调解之，实仍否定章氏看法。不难看出，黄氏是否在“上条陈”的争论，并非只是个人喜恶问题，而关系到黄宗羲的政治向背问题，弄清它，无疑对正确评价黄梨洲及其思想有极大裨益。

《明夷待访录》的写作出自于深沉的历史反思，这拿黄宗羲的话来说，也就是“余常疑孟子一治一乱之言，向三代而下有乱无治也”？他也承认，正是胡翰“十二运”给他带来了“三代之盛犹未绝望”的中兴希望，故而“条具为治大法”的。展读《待访录》，从“原君”直至“奄宦”诸篇，凡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等无所不包，俨然以王者师在运筹帷幄，这些显然也就是他奉献的施政纲领。

那么期谁来施之呢？黄“喟然而叹曰：昔王冕仿周礼著书一卷，自谓‘吾未既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吕事业不难致也’；……冕之书未得见，其可致治与否，固未可知也，然乱运未终，亦何能为‘大壮’之交”（序）！在否定他人的机遇不佳中，不正流露了黄自己对摆脱了厄运的自信、对良好机缘踌躇满志吗？其盼望有一个“明主”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设计的希冀之情，洋洋溢于言表，似乎还有点怀才不遇的焦渴呢；前述的“吾虽老矣，如箕子之见访，或庶几焉”及“待访”之书题无不表明他作书的目的即在于他时刻准备着为明主提供霸业咨询。

那么，他的“明主”指谁呢？三代之盛业可再现，但尧舜之圣不可复得；或许指明代的贤君？要回答这些问题，势必还要回顾这段特殊的历史环境。

《明夷待访录》写作于1663年，时时局已定，南明王朝早已灭亡，“窜匿草莽、东徙西迁，屡濒于危”④的黄宗羲抗清努力尽付东流，斗争意志也消磨殆尽，全祖望说他“始有潮息烟沉之叹，饰巾待尽”⑤；书中自称“梨洲老人”，有人据此研究认为，“梨洲”一词即含消沉之意⑥。凡此种种均说明，随着明王朝的灰飞烟灭，黄对之的希望也彻底消失了。在这种情形下，断定黄寄中兴希望于明朝，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臆测。

由此是否可以推论，黄宗羲的明主即暗喻清代圣人呢？

至少这一推论在理论上是成立的。历史发展至清初，遽然兴起了一股启蒙思潮，它猛烈地冲击了封建的价值观念和传统的思维模式，提出了许许多多石破天惊的言论。如古代的

"民本"观念就被升华到夺目的"民主"高度，人人倡言民重于君。顾炎武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⑦；黄宗羲说得更明晰，"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原臣），他坚决摈弃狭隘的君臣之论，斥之为"小儒"之见（原君），他认为臣的责任是"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原臣）这些无疑是在宣扬宗法血缘的万民至上论，也无疑的偏离了传统的"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忠臣不事二君的训诫，它逻辑地包含了，只要有利于天下万民，又何须死守一姓！只要人民安乐，朝代更换、既便异氏入主中原，又何干宏旨！因此，摆脱了传统家天下羁绊而又具有如此鲜明的启蒙观念的黄宗羲，在理论上接受清统治者并准备为之咨询，并非没有可能性。

那么在事实上是否也有可以证明这种可能性之迹象呢？

顺治十年（1653）黄宗羲写出了表达自己政治思想的第一部理论专著《留书》，其中"文质"、"封建"、"卫所"、"朋党"及"史"诸篇，充满了论辨华夷的文字和诋毁清朝的内容⑧；黄写作《明夷待访录》时，就有意识地删减了这些反清或排满的思想，只采用了《留书》中"田制"等未涉及清朝的文字。因而，我们虽然在《待访录》中能看到诸如"三代而下有乱无治"、"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等猛烈抨击封建专制的词句，但不见非议清朝的半个字；这是康熙二年（1663）的事；

康熙十八年（1679）以后，黄宗羲径直使用起清朝的年号了，据研究，散见于《南雷文约》、《南雷文定》、《黄梨洲文集》等黄氏著作中的墓志铭写上清朝年号的占绝大多数，⑨有的甚至直接称清朝为"国朝"⑩，很显然，随着岁月的流逝，黄宗羲也逐渐在实践上采取与清朝相认同的态度了；由此反推，日后的行动上的融合不正是最初观念契机的外化和实现吗？那么其所"待访"的客人起码在意念上是最切近的清"圣君"。

一定会有同志提出反驳："黄宗羲终其一身保持遗民晚节，何有取媚、出仕清朝之可能"？确实，反面的论据很多、也很有力；不过我们想说明的是，历史人物、尤其是社会发生天崩地解变化的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无不具有矛盾的双重性格，如他鼓吹"遗民"为"天地之元气"的论调，实也就是在肯定宗法血缘的家天下，而这与其超血缘的万民之上论不是截然水火难容吗？矛盾是实在的，但也要区分矛盾双方的历史消长及孰主孰次。纯文献的观察告诉我们，鼓吹"遗民者，天地之元气也"⑪大都在《待访录》之后，这或许是面对清朝无意于自己的录治大法，退而以求独善其身的只做"遗民"吧，但从此也可见写作《待访录》时，"遗民"观念尚不居支配地位，否则就难以写出前述的震聋发聩的启蒙言论了；而且，黄的"遗民"并不要求和清朝对抗，只是"止于不仕"的非直接参与清朝政治活动，故而其子出仕清朝黄也默认和接受了，——而本文的宗旨亦正欲要说明黄的《待访录》间接参与的特征，即正是在观念和策略咨询的意义上，我们说黄意欲为清朝指点江山。

---

①《说林·衡三老》。②《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③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卷五，页156。
④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中华书局，1983年，页126。⑤《明夷待访录》·跋·下引此书只注篇名。
⑥《清史研究通讯》，1986年2期，徐仲力：〈"黄宗羲'梨洲'、'南雷'两号探微〉。
⑦《日知录》，卷13。⑧《文献》（85年4期）。⑨南炳文：《黄宗羲政治思想的一个方面》。
⑩《黄梨洲文集》，"太垣勒公传"，⑪《黄梨洲文集》，"谢时符先生墓志铭"。